

学史帚稿

虞云国 著

春秋县制新探——汉代杂治考——对汉代孝道的再探讨

西汉前期治国思想上的儒道之争——兼谈窦太后其人与卒年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年代——李延年杂考——略论荀爽——《公瑕记闻》里的中越关系史料

中国传统归纳方法的近世转型——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吕思勉与新史学

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与新史学——世同已无陈寅恪

陈寅恪史学方法论——史坛南北二陈论

程应镠的史学研究——探寻历史的通解——评《中国历史通论》

泱泱大国的户口史巨著——评6卷本《中国人口史》

文化史年表编纂琐议——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和启示

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

学史帚稿

虞云国 著

25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史帚稿/虞云国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9.2

ISBN 978-7-80707-917-0

I. 学... II. 虞... III. 中国—历史—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057 号

本书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 J50405)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印 刷:安徽辉隆农资集团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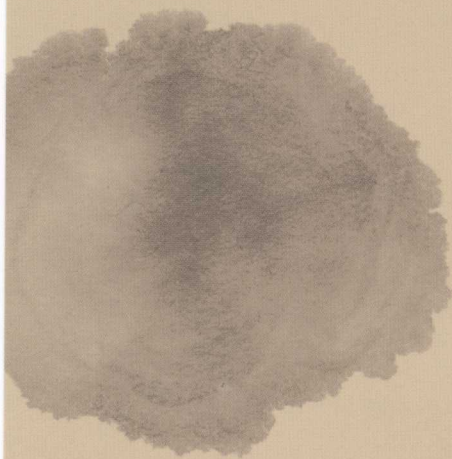
字 数:300 千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1948 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南部新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荊汉三言》等古籍十余种，发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史坛南北二陈论》等论文数十篇。近年的文史随笔结集为《古今多少事》、《水浒乱弹》。



责任编辑：周振华

翁涌 | 设计
wengyong@126.com

自序

三十年前，我以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的身份，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了本科学习。那年，我已经年届而立。作为68届高中生，按理，应该在1968年升入大学的。但1966年发起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彻底颠覆了一切正常的秩序，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理想。尽管被这场民族灾难与文化浩劫耽误了十年，相比之下，我还算幸运的，毕竟在十年之后还能圆上大学梦，改变了人生的路向，走上了学史治史之路。

当时有一句时髦的口号，叫做“夺回被耽误的十年”。逝水年华是夺不回的，那句口号也不过自欺欺人而已。但因有了关系家国命运的那段难忘经历，自本科起，在学史路上始终不敢有所懈怠。本书中《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和启示》一文，就是我在本科时选修法国史的深入思考。现在反观当时的思考，无非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研究与理解经典作家对这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全部论述”，这一认识竟然与当时提倡的“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那么合拍，不得人让人感慨时代对史学与史家的深层影响。

当时，我已将中国古代史确立为今后学史的主攻方向，但对其他历史仍有浓厚的兴趣。对这种广泛的学术兴趣，本科毕业后

2 学史帚稿

尽管做了调整，但仍未收缩到一个断代、乃至这个断代的某个专题上来。对我来说，这种对中国古代文史泛滥无归的爱好，利弊都是显见的：有利的是知识结构不算太仄迫，涉及领域也不算太单一（本书论文目录或能说明），治史过程中也颇能获得些支持意识；不利的则是心有旁骛，难以成为某个领域窄而深的专家。

1982年，我本科毕业，被程应镠先生留为助手。就在毕业之际，因先生的推荐，我发表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是宋史方面的。而他则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国宋史研究会推举为秘书长，并在上海师大历史系创建了宋史研究室。作为他的助手，我的专业方向不言而喻，也就是宋史。两年以后，先生把我招为宋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于是，我又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不敢说得到了先生的真传，却在不同场合多次撰写过介绍其生平与评价其学术的文章，本书所选《程应镠的史学研究》一文，也许反映出我立雪程门向先生学史的个人体悟。

程应镠先生治史，强调在史料与史识上的通贯性，他要求研究生不论搞中国古代史哪个断代，都必须认真研读完《资治通鉴》，包括司马光的考异与胡三省的注，也都必须下功夫钻研。研究生入学后，他对我说，既然你说已经读过《资治通鉴》，那就从《史记》开始，一史一史把正史读下去罢。于是，我不敢偷懒地读完了前四史，还有《左传》。本书中那篇《春秋县制新探》，就是研究生专业课“《左传》研究”的读书报告。公开发表后，其主要论点还被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与《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介绍过。本书中其他几篇两汉史论文，例如《汉代杂治考》、《对汉代孝道的再探讨》、《西汉前期治国思想上的儒道之争——兼谈窦太后其人与卒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年代》、《李延年杂考》，尽管有的是研究生阶段撰写并发表的，有的还在其后若干年，但无一不是那时学史的积累。在深度与广度上，这

些论文虽然不能与专治秦汉史的学者媲美，但却是我学前四史的一得之见。这种学史经历，对我以后的治史有着许多潜移默化的助益。

硕士阶段的学习毕竟短暂的。但对一个专业的史学工作者而言，一旦闯入这一领域，治史就是他的毕生事业；治史当然离不开学史，学史也就成为他的终生任务。我曾与友人说起过一个圆圈的比喻：你刚开始史学研究，确定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等于给自己划个专业的圆圈，作为今后致力的范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你会发现，在自己划定的专业圈里，有许多课题与其他专业圈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部分交叉叠合的状态；于是，你自然而然地会延伸学史的触角，将其深入到与原先划定的专业圈交叉叠合的相邻圆圈中去；在治史过程中，这种向相邻专业圆圈的不不断涉足与拓展，既有史料上的，也有方法上的；这样，在你原先划定的专业圈周边，交叉叠合的圆圈就会越来越多，整个专业的圆圈群也会越来越大。这种学史的阅历与体会，一般治史者都是不难心领神会的。在这本论文集里，不少论文也折射出我对那些交叉叠合的专业圆圈不断外延的学史历程。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我东渡日本做访问学者。日本大学的丹乔二教授是宋史学界的前辈同行，对宋代社会经济有着深湛的学养。在日本的一年多里，他几乎每周定时向我介绍日本宋史学界对宋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而他也正从事着中国历史上村落共同体的研究。回国以后，我与他始终保持着学术交往，本书中《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的译文，就是他的大作（收入佐竹靖彦主编的《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也算是我向日本同行学史的雪泥鸿爪。

本书中有两篇书评是向中国同行的学史心得。《探寻历史的通解》评的是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家范先生是我所尊

4 学史帚稿

敬的前辈学者，在我的学术道路上，给过令人难忘的关注与扶持；他对中国历史穿透古今的弘通识见，对史学研究与时俱进的创新追求，更让我由衷地钦佩。这篇书评是我对家范先生史学理论的学习笔记。《泱泱大国的历史巨著》评的是葛剑雄教授主持的6卷本《中国人口史》。人口史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为了写这篇书评，我不仅翻阅这部400余万字的大书，还阅读了法国学者索维的《人口通论》，尽量让自己不说或少说外行话。这样，在我的学史圆圈边际上又多了人口史与人口学的圆圈。

向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学治史方法，一直是我心向往之的夙愿。本书关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的几篇论文，就是这一学史过程的一行足迹。上一世纪末，我申请了一个关于百年史学嬗变录的科研项目，试图把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从揭橥“新史学”的梁启超开始，一个一个地把大师们的史学著作学习一遍，领悟他们的史学三昧，同时把他们的史学在百年大变局的互动中给以历史的定位。如果说，《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不为乾嘉作殿军》与《陈寅恪史学方法论》三篇，侧重的是前者，那么，《世间已无陈寅恪》与《史坛南北二陈论》则是对后者的一种尝试，也体现了我对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价值判断。遗憾的是，这一学史过程还未结业。还想对王国维、顾颉刚等大师的史学继续学习，分别写成论文。那时，也许可以另编一本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嬗变录的专题论文集。

本书中《文化史年表编纂琐议》，则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与同窗学友共同学史的副产品。当时，由我牵头发起主编一部《中国文化史年表》，作为总其成者，我把这部成自众手的《年表》原稿与校样分别通读与校改了一遍。这样，对编纂文化史年表的发凡起例略有一孔之见，对我们自己所编《年表》的长短得失也冷暖自知，于是就发为《琐议》。行文至此，遥想二十年前

编纂《年表》时，我们多次聚会热烈切磋的场面，令人生出树犹如此的感慨与友情长存的祈愿。

至于书中关于《公暇记闻》的论文，则关系到一次意想不到的学史机会。我所在学校有一个整理域外汉文小说的大项目，这一项目本来是古典小说研究者的禁脔与领地，哪有小僧伸脚的余地。《公暇记闻》是一部越南的笔记小说，而所记的都是近代以前越南史与中越关系史的史料。古代越南史与中国古代历史及制度关系密切，但那些古典小说研究者或许是不屑拓展自己治学的圆圈，就把这部笔记交给我去整理点校。实际上，对于古代越南史与中越关系史，我所知道的，也不见得比那些研治古典小说的专家多。这部笔记又是一个手抄的孤本，越南方面也未能提供对校的异本与他校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把校点这部域外文献作为一次新的学史机会，而我那不算太窄迫的知识结构在其间也颇起支持意识的功用。于是，我不但在中国史籍中找到了他校资料，还利用本校法纠正了底本的若干抵牾。在此基础上，还就《公暇记闻》里的中越关系史料写出了这篇论文。

值得交代的，还有那篇《略论荀彧》。我对历史的兴趣，如果不算少年时听《三国》读《岳传》的经历，就得承认与十年浩劫中那场“评法批儒”运动有关。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当时那种以学术形式展开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虽然吊诡，却激发了包括我在内的相当一批年轻人的学史兴趣。1975年初，正是那场运动的后期，我准备写这篇文章。当时辗转托人从一所中学图书馆里借来《后汉书》与《三国志》，仅凭着这两部正史，也不管自己是否缺乏专业训练，就写出了题为《试论荀彧的政治立场》的初稿，当时把他说成是法家的对立面。进入大学后，程应镠先生开魏晋南北朝史选修课，让我有可能重新思考对荀彧的评价，于是就把旧作改写为《略论荀彧》作为选修课的论文。我对荀彧的观

6 学史帚稿

点至今未有改变，此文后来删去了学究气的文句与学术化的注释，发表在《文史知识》上，也曾收入我的文史随笔集《古今多少事》。这次收入本书，恢复其史学论文的规范样式，也算是立此存照，提醒自己：在学史起步之际，你也是喝过那一口狼奶的。

对于书名中“学史”两字，已经说了不少，而对“帚稿”的说明也就相对简单了。南宋包恢曾自署文集曰《敝帚稿略》，据其《自识》说，他见到亲友为其“收拾类聚”的文稿，因“不能掩其恶而匿其丑”，就略作汰选，“姑别存之，名曰《敝帚稿略》”。推原其取名本意有二：首先，是不满意自己的旧作；然后，是不忍完全弃之不顾而有点敝帚自珍。这种矛盾心理，似为多数文人学士所共有，也是本论集取名的原因。有关三十周年的纪念，今年似乎不绝于耳。蓦然回首，自己正儿八经地开始学史，至今居然也已经三十年了。于是就把三十年来的学史论文编了两本集子：一本集子专收用力相对较多的宋代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而把其他史学论文扫进了这本名为“帚稿”的集子。

尽管是“帚稿”，在收入论文集时，不但改正了当初发表时误植的文字，也补足了发表时因各种原因被删节的文字。最后，对本书出版鼎力相助的各位先生深致谢意，他们是北京花生文库总经理王瑞智先生，黄山书社社长左克诚先生与本书的责任编辑周振华先生。

2008年11月8日

目 录

自序	1
春秋县制新探	1
汉代杂治考	14
对汉代孝道的再探讨	22
西汉前期治国思想上的儒道之争 ——兼谈窦太后其人与卒年	35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年代	42
李延年杂考	48
略论荀彧	59
《公暇记闻》里的中越关系史料	72
中国传统归纳方法的近世转型	82
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 ——吕思勉与新史学	102
不为乾嘉作殿军 ——陈垣与新史学	130
世间已无陈寅恪	154

2 学史帚稿

陈寅恪史学方法论	177
史坛南北二陈论	223
程应镠的史学研究	255
探寻历史的通解	
——评《中国历史通论》	270
泱泱大国的人口史巨著	
——评6卷本《中国人口史》	282
文化史年表编纂琐议	295
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和启示	304
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译文)	312

春秋县制新探

中国历史上，在全国普遍推行县制，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事情，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政策的继续。但县制的产生还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对此，前人已有研究，作了论断。本文试图对旧说中一些观点略作辨正，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春秋史料中“县”之涵义

在有关春秋史料中，“县”以名词出现时，多与典制有关。稍予辨析，可知“县”一词具有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涵义：

第一种涵义指县鄙。周初封建（本文“封建”一词均指裂土分封的意义），就每一封国而言，“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国语·齐语》韦昭注），“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国语·楚语》）。从《国语·齐语》所载管仲“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的说法及其为齐国规划国鄙制度的史实，可以推断，凡国以外地区都是鄙，国指封国的国都，而鄙就是相对国都而言的较为鄙远而广大的地区。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

居蒲城，夷吾居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即说“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国都）”，可印证此论。《说文》：“县，系也。”本是悬挂的意思，县鄙似有四鄙以国都为支点而悬系之义。县鄙这一复合名词频频见于先秦史籍：如《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子产说郑国将沦为“晋之县鄙，何国之为？”次年齐晏子说“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有时以单独的“县”来指县鄙，在春秋史料中也不乏其例。

第二种涵义指都邑。邑，最宽泛的涵义就是聚落，即《公羊传·桓公元年》所说的“人聚会之称也”。至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已是具体而论了。西周封建之初，有宗庙先君之主的都仅指诸侯国都（亦即国），与此相对的即县鄙。诸侯国君封赐卿大夫的食邑不可能在国都之中，只能在县鄙之地。受封的卿大夫及其宗族，一般都居住国都之中，仅派家宰去管理封邑上的事务，这种封邑是世袭的私邑。周天子与诸侯还有一些公邑，直接委派大夫去管理。由于卿大夫势力的不断扩张，公邑私邑化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到春秋中后期，公邑已微乎其微了。卿大夫势力逐渐膨胀的另一表现，就是在其封邑上也建立起了宗庙先君之主，例如晋赵氏就在温建了祖庙（《左传·昭公元年》杜预注）。这种邑也称都或大都，鲁国三桓之三都，即其例证。邑大小不一，有所谓“千室之邑”和“十户之邑”之别（《论语·公冶长》），但也许因为最初邑是在县鄙之地发展起来的，于是县又与邑组成了县邑这一复合名词，以反映春秋时期城邑之兴起。《礼记·檀弓上》说“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皆厌冠哭于大庙”，是这一涵义的合适书证。《檀弓下》说卫君为表彰太史柳庄，“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书而纳诸棺曰：世世万子孙毋变也”。郑玄注曰：“裘，县；潘，邑名。”王懋竑曰：“裘氏潘氏，二邑名。”（《礼记训纂》）《礼记》

虽非春秋时书，但这种县、邑通称却在春秋史料中并不少见。据《汉书·古今人表》次第，柳庄为春秋末叶人，显而易见，这里的县或县邑仍是分封性质的卿大夫食邑，并非指后来县制的含义。

第三种涵义才是作为后来行政区划的县制的概念。这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

既然春秋史料中县有不同释义，研究春秋县制时，就必须对涉及县的材料作一番严格的鉴别，汰选出第三种释义的史料，切忌“拣在篮里就是菜”。

不难发现，第一种涵义与“县”字本义最为接近，与第三种涵义较易区别。《国语·齐语》中管仲为齐桓公制鄙时有段议论：“制鄙……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其中虽多次出现县字，但均不是郡县之县，而是县鄙之县。《国语·周语》单襄公引周制“国有班制，县有序民”的教训来对照陈国“国无寄寓，县无施舍”的现状，这里的县仍指与国对举的县鄙。《左传·昭公四年》鲁大夫申丰说“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所谓县人，杜预注曰“遂属”，也即县鄙之人。

而县的第二种涵义虽由第一种涵义推衍而来，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却最易与第三种释义混淆。从战国诸子书和《国策》直到《史记》《汉书》，往往把县邑连称作为郡县之县的同义语。与此同时，又往往随笔所之，用单独的县来表达县的第二种涵义，即封赐给卿大夫的都邑。试以《史记》为例。

其一，《楚世家》记楚灵王时内乱，右尹劝灵王“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此事，《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右尹子革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可见《楚世家》所谓大县乃大都，指楚国大夫的封邑，而非县制之县。

其二,《吴世家》载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一事,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据之认为吴国有县制,^[1]是值得推敲的。《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亦载此事,杜预注曰:“朱方,吴邑。”可证朱方之县并非直属吴王的郡县之县,不过是吴王赐封给庆封使其安顿族人的封邑而已。而春秋时诸侯对他国来奔的大夫,视本国大夫例,赐以封邑的情况并不少见。《左传·襄公二十年》,郑国“羽颉出奔晋,为任大夫”;《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国贲皇、雍子先后奔晋,晋分别赐予晋邑苗与鄙,及至伍举去楚,晋又“将与之县”,都是例证。显然,庆封得到的朱方之县与晋人对伍举“将与之县”,都是分封食邑,绝不具有县制的性质。

这些例子说明,甄别春秋史料中县的不同涵义,是研究春秋县制的症结所在。此外,还有“县”字在古汉语中名词动词化的问题,也是应当细加分别的。为了便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必要对县制规定一个标准,借用顾颉刚先生语,即“直隶君主,没有封建的成分在内”的行政区划单位。下面,我们就依据这个标准,来进一步探讨春秋县制的有关问题。

二、春秋秦楚县制质疑

顾颉刚先生认为,秦、楚“每灭掉一国就建立一县”,并据有关史料著录的年代推断“县制在春秋初期确实有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沿袭了此说。这种秦楚灭国建县的说法,对各种通史及先秦史论著影响颇大,然而,这一说法却是值

[1] 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本书引顾先生论述,皆据此文,不再加注),《禹贡》七卷六、七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本文引童先生论述,皆据此书184至186页,不再加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版。